



中日网

---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当前位置: 首页 > 研究专题 > 中日关系 > 论文

中日关系的历史困境及出路思考

发布时间: 2010-03-28 点击次数: 520 作者: 吕晓莉 钟 准

[摘要] 近年来因历史问题而矛盾激化的中日关系的确可以用“瓶颈”来形容。本文试运用国际关系学理论来分析中日关系以及历史问题在其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可以解释当前中日关系的困境,历史问题是加剧安全困境的导火索;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暂时无法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其中最大障碍是历史问题的存在;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最为重要的是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自我制约。

[关键词] 中日关系;历史问题;国际关系理论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1-0041-45

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近年来由于历史问题引发的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两国关系处于1972年建交以来史无前例的瓶颈状态。随着五次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在2006年9月卸任,两国外交关系逐步升温,中日最高政治领导人之间恢复了互访,(1)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与2004、2005年相比也较为缓和。但在根本上,历史问题等纠纷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任何一点争议的火星都有可能导致两国关系再次坠入冰窟,中日关系的前景仍不容乐观。

在两国存在的各种矛盾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根本原因,在它的驱使下,唇齿相依的中日之间却渐行渐远?在“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的现实下,中日关系怎样才能拨开阴霾而重见阳光?这些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借助国际关系理论来进一步思考。

一、结构性矛盾中的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被广泛用来解释国家间的紧张、对立和冲突原因。它最早由赫兹(John H. Herz)和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分别提出,在安全困境中,“集体和个人总是担心遭到他者的攻击、支配、统治或摧毁,为获得安全,他们不得不去获取尽可能多的权力以免受攻击。但反过来,又会使他者感到更不安全而去做最坏的打算。”(2)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而产生了疑惧和不安全之感,而相互疑惧、争夺权力则会陷入类似军备竞赛的螺旋循环(Spiral Model)。

经典现实主义将安全困境的形成原因归结为人性。巴特菲尔德认为这种“霍布斯恐惧”来源于人类原罪,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之首也是“像社会的一般现象一样,政治受到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的支配。”(3)但赫兹认为这与人性善恶无关,而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当现实主义发展到结构现实主义阶段,沃尔兹认为“国家之间,正如人与人之间一样,无政府状态,或者说是没有政府的状态,是与暴力的发生联系在一起。”(4)结构现实主义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描述为一个自助体系,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和相互疑惧不可避免。随着结构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理论,“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说法占据了上风。以安全困境理论来研究中日关系也在国际关系学界盛行,“因为一个新的大国崛起往往会加深国际结构中的不确定性,必然引发霸权国和周边国家的‘疑惧之心’和强力反弹,导致常态下的国家关系骤然陷入结构性的安全困境之中。”(5)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同时复苏,使东亚第一次处于两强并立的结构中,“崛起的中国和崛起的日本之间日益加剧的竞争将在该地区造成最大的安全风险。”(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如海湾战争后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案”

(PKO法案)、强化美日同盟、与美国共同开发TMD、通过“周边事态”法案、“9·11”后向印度洋派遣军舰支援美国反恐等,都表示关注和忧虑。日本方面则对中国军费的增加,以及1995年的核试验和1996年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军事演习表示不安。尽管双方的政策和行动都是为了加强自身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其中可能并无恶意,但却让对方感到威胁。因此,“日中关系已经形成了典型的安全两难,并因为痛苦的记忆和民族冲突而加强。”

(7) 杰维斯认为决策者心理的知觉和错误知觉是导致安全困境的因素,而历史认识则是知觉和错误知觉的来源之一。(8) 中日历史问题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冲突,双方以史为鉴的同时也可能背上历史包袱而成为历史的囚徒。例如,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或是修改历史教科书可能会唤起中国领导人的历史经验而怀疑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于是中国不得不采取强硬反应。而同时,中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教育,也被日本认为是中国政府对大众进行“反日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妥协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新现实主义认为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安全困境来自宏观的结构性权力矛盾,而历史问题则在微观的心理层面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尽管可以建议政治精英们采取谨慎的政策,小心翼翼地避免感情用事,但是只要中日之间的权力“结构”不改变,东亚的未来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已经有过预演:雅典的崛起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不可避免。(9)

二、相互依赖模式的无奈

那么,中日贸易的繁荣是否能带来双方的相互依赖,从而阻止冲突和战争?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基欧汉和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理想模式,通过跨国公司和NGO等多渠道联系,军事安全不再是国家间惟一的重要议题,一国也不会对区域内另一国使用武力。(10) 例如法国和德国,通过战后由经济相互依赖开始的欧洲一体化,最终达成和解。目前,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07年两国的贸易额已经达到2360.22亿美元。(11) 双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已相当之高。

问题在于,在东北亚历史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中日之间缺乏法德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历史和解、区域共识。所以,相互依赖不一定带来合作,反而会带来各种摩擦。例如,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了中国学生的大规模示威,而当时中日贸易逆差的急剧扩大则被认为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也在战后再次出现。同时,由于相互依赖往往是不对称的,依赖性较小的一方可以利用依赖关系作为筹码来讨价还价甚至影响其他问题。(12) 例如,当“爱国青年”认定日本对中日贸易的依赖敏感度和脆弱度高于中国时,“抵制日货”就成为抗议历史问题来打击日本的手段。这又回到沃尔兹自助体系的困境中。面对共同获益的合作可能时,国家更关心谁将获益更多而不是大家都能获益:“只要双方担心对方会把增加的实力用于权力扩张,那么,即使双方同时拥有大量绝对获益的前景,还是不愿意合作。合作的障碍不一定是双方的特性和直接意图,而在于不安全的状况,而最起码的不安全就是双方无法确定对方将来的意图和行动。”由于国际体系中缺少一个公共权威,国家不愿增加自己的依赖性而努力独立自主。(13)

自称“自由学派的现实主义者”的吉尔平认为霸权可以起到公共权威的作用,提供公共物品并保持体系稳定。(14) 那么这种理论的现实选择是中日之间的和平有赖于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一边看住日本一边遏制中国。而霸权之后,新自由主义认为制度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公共权威的作用来保障合作。但东北亚的现状却是,中国不满美日同盟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努力谋求新的多边安全机制,却受困于滞后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和缺少有效的合作制度的现实。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相互依赖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在两国之间也仅仅体现为“政冷经热”,而难以起到保障和平的作用。

三、建构主义的可能解决途径

应当承认,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分析十分符合当前中日关系的事实,但事实也并非是一成不变。E.H.卡尔认为社会事实和物质事实是不同的,“政治学研究的事实可以通过人们的愿望加以改变。如果研究人员中日关系的历史困境及出路思考在思维中已经存在改变事实的愿望,并通过他的研究使其他人也接受这种愿望,那么,一旦接受的人达到足够的数目,事实就会得到改变。”(15) 而中日之间的“事实”如果是“必有一战”,那么爱好和平的人们就应该去改变它。

怎样改变?尽管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跨国公司、NGO、国际机制、一体化等名词频繁见诸报端,但国家体系仍是国际政治的研究起点。(16) 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认为国家是真实的行为体,具有内在动机特性——国家利益。(17) 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无政府状态也符合现实。但温特不承认存在结构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逻辑”,即无政府状态是本质上自助的体系,会产生军事竞争、势力均衡和战争。例如中日之间形成的“结构”性矛盾,温特提出结构是由观念构成的,观念建构了权力和利益。进而,温特根据国家之间互动的不

同性质,归纳了三种“无政府文化”来代替单一的“无政府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18〕

霍布斯文化。国家间互为敌人,相互残杀,以改变现状,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在前民族国家时代,酋邦、城邦和帝国之间动辄进行灭国之战。中日关系史上,13世纪忽必烈两次征日,16世纪丰臣秀吉欲先占朝鲜进而征服中国,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沦亡朝鲜,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是霍布斯文化的表现。洛克文化。国家间仍存在着竞争关系,利益冲突仍可能引发战争,但不再以征服他国和侵占领土为主要目的。主权原则的确立使国家之间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强国不再能吞并弱国。目前中日关系即属于洛克文化,虽然关系冷淡充满竞争,但除了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仍停留在霍布斯文化的阶段外,中日之间已不再把消灭对方作为国家目标。

康德文化。在这个体系中,国家间互为朋友,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而不计较自己的得失。非暴力和合作是康德文化的主要特征,国家之间也不再存在安全困境,而是形成了一个永久和平的安全共同体。这也是中日关系所应追求的最高境界。

与现实主义悲观历史循环论相比,温特的建构主义从理论上为国际政治以及中日关系提供了一条较为可行的进化途径。实际上,国际关系从霍布斯文化到洛克文化,已经是一种进步。“即使无法保证国际体系的未来会一定比过去好,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差。”〔19〕

而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进化怎样才能发生?康德文化需要的集体身份如何形成?温特分析了四种主变量(Master Variables):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前三者是主动或有效原因,而自我约束是助然或许可原因,“形成集体身份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有效原因变量和自我约束变量的结合。自我约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如本文第二部分提到的,中日之间的相互依存仍然可能导致不合作的悖论。同样,尽管在中日之间也存在一些共同命运和同质性,例如面临的共同挑战或是具备文化相似性,但如果不能确信我们的需求能得到重视而不是仅仅被利用,就又回到自助体系的困境中:我们无法推断对方的意图,对方是否利用合作进行权力扩张?而错误的判断将导致致命后果。

温特认为国家之间正确的互相判断是可能的,文化(即共有知识)会帮助我们。在中日之间即使只有洛克文化的共识也会使一方相信另一方不会消灭自己,两国起码会做到自我制约。问题在于,“其他国家怎样知道一个国家是自我制约的?”温特给出了三个回答:第一,受外部因素的胁迫或出于利己目的不断服从规范最终将其内化;第二,通过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制约;第三,自我束缚。〔21〕如果以中日关系设问,第一个回答因为缺乏外部因素的制约而难以成立(惟一可能是美国的霸权),后两个回答则必须回到国内政治的语境中。

如果说温特的理论是体系层面上的建构,很少讨论国内因素,另一位建构主义学者卡赞斯坦则开创了单位层面上的社会建构理论。卡赞斯坦研究了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安全观念的建构过程,突出了制度化规范和身份认同的作用:〔22〕制度化规范上,战后日本由文官执政,保守政党力量强大,军队受到严格限制而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国家与社会关系紧密。美日同盟保障日本安全的同时,美国压力也被内化到日本政策制订过程中。集体认同上,历史经历和记忆通过阐释被赋予意义,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战争失败的不同历史记忆和解释使日本的认同具有深刻的内在矛盾,通过竞争和碰撞,例如上世纪60年代的“安保斗争”,最终形成强经济、弱军事的日本国家身份。这也造就了“一个简单而又令人吃惊的事实:以国际标准衡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警察和军队很少情愿使用武力。”卡赞斯坦别有趣味地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建议:“没有必要根据日本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事实,就推断出它会回到20世纪30、40年代的军事扩张道路上《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去。”〔24〕

卡赞斯坦的《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成书于1996年,十年间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民族主义思潮的上升推动着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事件令人不安,这是否昭示着日本将修改和平宪法进而重整军备?尽管这可能是杰维斯所说的“错误知觉”,尽管这些在日本国内也存在巨大争论。但如果日本政治家在历史问题上无法做到自我制约——这一建构康德文化的关键变量,那么中日关系则难以走出安全困境。同样,尽管我们常常自信中国可以做到自我制约、和平崛起,但如前文所述,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日本知道我们可以做到。客观地说,中国部分民众在对待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时带有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一些过激行为,也严重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历史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对社会舆论进行了负责任的引导,例如在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外交部就统一部署了“中日关系形势宣讲团”在全国各地举行报告会等活动。可见,从中日友好、东亚和平的大局出发,中国方面同样需要加强自我制约。

四、中日关系的出路探讨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现实主义理论对中日关系的现状研究十分有说服力,中日关系目前陷入的僵局的确与两

国力强的消长有关。但现实主义理论对问题的解决显得过于悲观,比如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崛起必然先在地区称霸,进而在全球称霸。(25)自由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解决方案,即中日通过相互依赖来避免战争,但在现实中由于历史问题的存在,相互依赖非但没有能解决问题,反而提供了更多的摩擦可能。而建构主义理论似乎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提供了一幅可能的美好蓝图:在历史问题上做到自我制约的基础上,通过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最终形成共同的规范,循序渐进地改善中日关系。

从面向未来、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建构主义理论显得比主流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更具吸引力。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可能建构友好的中日关系,但绝非是在我们想象的理想条件下建构。通过现实主义的分析,我们必须接受中日关系的严峻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下一步“怎么办”,自由主义理论虽然没能完全解决问题,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正因如此,本文主张在处理中日关系这样的具体问题上,在理论和方法上应该持有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才能对中日关系有一个整体把握,并对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而对国际关系学理论来说,通过中日关系这样的经验研究,也可以推动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和进步。

回到中日关系的外交实践中来,首先应该意识到,正确认识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是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这是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中一再被强调的。中方一贯反对日本国内存在的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和行径。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必须认识到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它涉及到两国国民的民族情绪,其解决过程只能循序渐进,不应操之过急。历史问题虽然重要,但毕竟只是中日关系的一方面,在历史问题上进行自我制约,也有利于中日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合作和获益,也是符合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的。

令人欣慰的是,中日两国的政治精英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在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国事访问中,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中表达了“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的立场;(26)并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其中“双方积极评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发挥的作用,同意继续开展这一研究。”(27)正如胡锦涛主席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时所说:“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让各国人民永享太平。”(28)这也是中日两国研究历史问题和两国关系发展可能路径的意义所在。

[注释]

(1) 包括被称为“破冰之旅”的2006年10月安倍晋三前首相访华,“融冰之旅”的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迎春之旅”的2007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暖春之旅”的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

(2)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 1950, p. 157.

(3)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7th ed), McGraw-Hill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

(4)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cGraw-Hill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2.

(5) 封永平:《大国崛起的安全困境与中日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2期,第36页。

(6) [美]埃兹拉蒂:《变——日本变局如何改变世界局势》(M),沈建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25页。

(7) [美]马斯坦杜诺:《不完全霸权与亚太安全秩序》,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M),韩召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8)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章“威慑理论、螺旋模式与对手意向”,第六章“决策者怎样从历史中学习”。

(9)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ook I Chapter 23, Penguin Books, 1972, p. 49.

(10)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Pearson Education &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0-32.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亚洲司:《2007年1—12月对亚洲国家地区贸易》, <http://yzs.mofcom.gov.cn/aarticle/g/date/k/200802/20080205366505.html>。

(12) 同注(10), p. 9.

(13) 同注(4), pp. 105-107.

〔14〕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15〕 [英] E. H. 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 秦亚青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 第5页。

〔16〕 跨国行为体实质上通常是由特定国家的一群相关人员组合而成的。例如, 如果将管理层的国籍当作忠诚取向标

志的话, 跨国公司也是以国家为联系纽带并以此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的。参见 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5, No.3, 1971, p.336。

〔17〕 [美]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五章“国家与团体施动问题”。

〔18〕 同注〔17〕, 第六章“三种无政府文化”。

〔19〕 同注〔17〕, 第387页。

〔20〕 同注〔17〕, 第431页。

〔21〕 同注〔17〕, 第449—452页。

〔22〕 [美] 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M), 李小华译, 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23〕 同注〔22〕, 第1页。

〔24〕 同注〔22〕, 序言, 第2页。

〔25〕 [美] 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 王义桅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26〕 新华网:《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07/content_8123814.htm。

〔27〕 新华网:《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08/content_8131010.htm。

〔28〕 新华网:《胡锦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演讲(全文)》,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5/08/content_8131916.htm。

(原文转载于《国际论坛》2009年第1期 编辑: 秦利明)